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 路径与政策研究

金喜在 等/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 路径与政策研究

金喜在 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本书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及其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相互关系,从宏观经济发展视角审视农民工的发展变化历程;通过总结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和基本实现路径,采用数据分析剖析市民化过程中的障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在创新构建市民化成本及其分担机制的前提下,提出保障农民工基本财产权益和发展权利的市民化路径。

本书可供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作为参考教材使用;同时对于关注我国城市化进程、收入分配及就业、“三农”等问题的读者也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与政策研究/金喜在等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03-051292-5

I. ①中… II. ①金… III. ①民工-城市化-研究-中国 IV. ①D42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19432 号

责任编辑:马 跃 李 莉 王丹妮 / 责任校对:高明虎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无极书装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影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1/2

字数:292 000

定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金喜在，男，朝鲜族，1954年1月1日生于吉林省永吉县，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86年晋升为讲师，1988年破格晋升为经济学副教授，1992年破格晋升为教授，并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东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东北师范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商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任、人力资源管理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参加工作以来主持并完成了16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及横向课题的研究任务；发表了100多篇经济学学术论文，出版了13部专著和教材；有6项科研成果获得了吉林省政府的奖励。

目 录

第一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背景分析	1
第一节 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依据	1
第二节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概念界定	10
第三节 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14
第二章 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路径与经验借鉴	25
第一节 英国农民市民化的经验分析	25
第二节 美国农民市民化的经验分析	26
第三节 德国农民市民化的经验分析	28
第四节 日本农民市民化的经验分析	30
第五节 韩国农民市民化的经验分析	32
第六节 国外农民市民化的启示	34
第三章 我国城市化的历程及现状	38
第一节 我国城市化的历程	38
第二节 我国城市化的现状	42
第三节 我国低水平城市化带来的矛盾	57
第四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与路径分析	63
第一节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现状	63
第二节 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89
第三节 农民工市民化的几种路径选择	99
第五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因素分析	113
第一节 常用数据分析方法	113
第二节 实验数据与数据分析工具	118
第三节 关联分析	120
第四节 统计分析	125
第五节 综合分析	139
第六章 我国农民工财产权益保障问题分析	145
第一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流转对我国农民工影响	147
第二节 宅基地及其房屋产权等财产权益保障问题分析	161
第三节 保障我国农民工财产权的相关社会条件	166

第七章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构成及分担机制构建	174
第一节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内涵及构成要素	174
第二节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路径选择	183
第三节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构建	193
第八章 推进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创新问题思考	202
第一节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创新问题探索	202
第二节 进城农民土地承包权出让制度创新的思考	210
主要参考文献	218

第一章 农民工市民化的背景分析

第一节 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农民非农化思想基本点

马克思、恩格斯等在其主要的著作当中有关农业问题的论述是比较多的，他们关注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中蕴涵的科学理论，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重点是：国民经济当中农业所处的地位问题，如何实现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城市与农村之间、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差别、差距问题，农民身份问题和阶级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农民、农业、农村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长久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研究也比较关注。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等在世时还没有出现农民工现象，也就没有这方面的详细分析，但是，相对地，他们把重点放在了农村人口的转移问题，即农民的非农化和就业问题，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这些优秀的研究成果也在理论上指导了我国如何解决关于农民工的问题，意义重大。马克思关于农民非农化及农村人口城市化的简要观点如下^①。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农民非农化问题与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密切相关。从狭义上说，农民非农化具体是指农民职业身份的转换。从广义上说，农民非农化不只是指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农民在社会城市当中所处的地位、在生活方式和心理上如何融入城市及文化程度的提升等一系列方面产生着市民化或者说城市化的转变。在基本内容上，从广义的角度来分析，农民非农化与农民市民化是一致的，但从狭义的角度看，两者的侧重点则各有不同。

马克思主义首先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全面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农民非农化问题。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工业化开始出现，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度展开，部分农民开始向城市转移，从事工业生产，这成为农民非农化的根本原因^①。因此，我们可以说，农民非农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农民非农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要想了解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尚未深度展开之时的人口流动情况，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维逻辑，应先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入手。马克思认为，社会分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体现。马克思用社会分工来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①。所有经济发展趋势都可以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城乡分离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是,有一点则不可否认,在农民市民化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和对立,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所以,我们可以说,城乡分离是农民非农化,也就是农民向城市转移并实现非农就业的基本前提,即农民的市民化和非农化。这就充分说明了作为生产力发展结果的农民非农化的必然性。即便如此,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经济条件下,社会分工是尚未形成的,即便已经开始有城乡分离的现象,大规模的农村人口非农化现象并没有出现。对于这一现象,马克思认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①。换句话说,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自然经济尚未解体、社会分工形式较为简单的条件下,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和非农就业的现象并没有出现。

伴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活动中工场手工业的地位逐渐被机器大工业所取代,这也带动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进一步过渡。在经济社会中,工业开始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部门。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时,城市周边的农村也逐渐受到了市中心工业化的影响,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进步和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减少了农业所需的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显现,这些人开始离开农村向城市中的工业企业集中,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现代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把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赶走,而使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①也就是说,在现代工业社会发展初期,最稳定、最保守的农业人口的数量正在锐减,转而变为拥有巨大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企业中聚集起来。简而言之,在工业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经济社会中的主导部门的一系列过程中,由于与传统农业部门相比所显现出的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益率,工业部门吸纳大量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农民非农化的道路。

总之,有一点不可否认,即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工业化发展和社会分工深度展开是实现农民非农化的必然前提。以英国为例,在工业革命初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萌芽开始出现,新贵阶级通过圈地运动,强行没收农民的土地,农民失去生产资料,失去了将其束缚在农村中的枷锁,为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条件。同时,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工业开始成为经济社会的主要生产部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门,并影响到农业领域,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和机械化生产,解放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为农民非农化提供了条件。这些农民与资本主义产生之前的农民有很大区别。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①。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相分离为前提条件。这种分离也成为人口自由流动的前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先决条件^②。简而言之,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工业化和社会分工,为城市和工业企业大规模吸收农村劳动力创造了条件。

第二,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也是农民非农化的重要动力之一。恩格斯对于农民非农化问题的深入分析是在1984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当中^③,这要比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等提出的劳动力转移理论早100多年。恩格斯认为,工业部门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工业部门提供给劳动力的工资又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就业,并迅速聚集于工业企业当中,成为工人阶级。恩格斯认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工资差异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重要动力^④。实际上,由于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所限,再加上传统农业生产相对分散、劳动力流动性差、生产方式相对保守等特点,传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现代化工业。同时,现代化工业为城市的居民带来了较高的收入,工业化企业所提供的工资远高于农村,这就大大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造成了城乡生活水平和收入的差距。上述一系列描述使农村与城市、传统农业与现代化工业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距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重要动力之一。

第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非农化的实现途径有两种:“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⑤正是由于城乡之间的不同特征,农民非农化的实现途径也有所不同:一种途径是农民异地非农化,即农民通过向城市转移实现非农化,这主要是由工业化发展带来就业岗位增加及交通业的发展引起的;另一种途径是农民就地非农化,这主要是由城市工业向农村扩张,带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引起的。发达国家和包括我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过此类情况。前一种农民非农化途径符合城市集中性的特质,后者则与农村相对分散、孤立的特质相适应。

第四,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其原始积累与社会人口的自由流动密不可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般都是以暴力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的,其中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通过暴力手段圈占农民耕地,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使农民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迫使农民向城市转移,到工业企业中就业以维持生计。通过圈地运动来剥夺农业生产者的土地是英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基础。小租佃者也同时存在于那一时期,除了日常种地之外,他们还从事纺织生产,而在现在的英国,这些人已经不存在了。后来,几乎全部土地都被划为为数不多的大庄园并通过出租谋利。大租佃者通过竞争将自耕农和小租佃者排挤出市场,导致他们在生活中穷困潦倒。在这种情况下,自耕农和小租佃者变成了雇农和第一批纺织工,通过获得工资以维持生计,这些人大规模涌入城市并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和发展。资本主义先发国家在发展初期都有相类似的通过暴力掠夺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

第五,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非农化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身份由农民向工人的方向转变的过程,这种身份的转变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相比农民,工人阶级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新型资产阶级对农民的不断掠夺和驱逐,为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简而言之,促使全体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巨大变革的原因就是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它将之前仅是一种可能性的集中现有资源进行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方式变成了现实。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大量农民不断转变为工人阶级。

二、产业转移理论

17世纪开始,古典经济学派就已经对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产业结构变化是引起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威廉·配第认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重心必将由有形的财物生产逐渐转向无形的服务性生产。1691年,配第根据当时的英国国情,认为就不同产业所获得利润的多寡而言,商业所获利润一般大于工业,工业则大于农业^①。因此,根据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假说,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再向商业部门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20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计量方式比较了不同工资收入水平下,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中所表现出的变化趋势。他认为,他的这一发现印证了威廉·配第在1691年提出的观点,因此,学术界将这一发现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原因,认为不同产业之间存在利益差异,是促使农村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根本动力。

克拉克根据费希尔的三次产业划分的学说,发现了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就业之间关系的演化规律。具体来说,在一国之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第一产业的

^① 配第 W. 政治算术[M]. 陈冬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8-23.

生产总值和就业人口的比重会有所下降^①，第二、第三产业则会相对依次上升。进一步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劳动力将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再向第三产业流动。

克拉克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一规律，主要是由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决定的。对于需求因素而言，克拉克得出的结论如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农业产品的相对需求持续下降，而对制造业商品的需求则不断上升，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制造业商品的需求也开始下降，服务业需求逐渐上升。克拉克还认为，狭义的服务业，即仅限于对消费者的服务，并不会表现出较高的边际需求。然而，广义的服务业不仅包括对消费者的生活服务，还包括为企业提供的生产服务，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的社会需求与其他产业相比呈上升趋势。除了不同产业之间的相对需求差距之外，不同产业间的生产效率差别也是造成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①。

克拉克认为，三次产业的生产效率各有不同。在同一个经济社会中，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往往要比其他生产部门高。因此，工业部门的静止的相对需求将会造成该部门劳动力就业比例下降。另外，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但是，一般来说，相比工业部门，上升速度并不快。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上升与社会对农产品需求的不断下降之间的相互作用，直接造成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得到了巨大的提高。这主要得益于人民生活对第三产业创造出的服务产品需求量越来越高，导致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口比重也相应提高^①。

克拉克认为，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从事先的假设中推断出来的，而是对现实社会中的经济活动进行观察得出的。他在《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经济学的本质应当建立在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上。因此，克拉克的产业结构理论体现了他对经济问题思维方式如下^①。

（1）克拉克提出的产业结构理论将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产业分为三类，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并以此为分析框架。

（2）克拉克从就业人口的角度分析三次产业的演变过程，考察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

（3）克拉克通过考察单位时间内若干国家的经济活动，分析了一国产业结构变化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

（4）克拉克通过对最终需求的收入与价格弹性及劳动生产率的分析来研究现有经济问题。

因此，从克拉克所提出的理论的发展脉络看，他的理论主要来源于威廉·配

^① Clark C G.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40.

第关于产业之间收入差距的变化的规律性描述及费希尔对三次产业的分类。

三、城乡二元理论

产业结构理论是揭示关于国民收入与不同产业间就业人口分布情况的变化及其原因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茨涅兹于1941年在其著作《国民收入及其构成》中分析了国民收入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①。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克拉克的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他将搜集到的大量与之相关的文献和历史资料进行了总结和梳理，分别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称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部门”，并通过整理数十个国家国民收入和产业间就业人口的分布数据，从时间序列角度和横断面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

(1)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部门的收入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而且农业部门的收入比重下降幅度要超过就业人口比重的下降幅度。另外，在大多数国家中，相比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农业部门的收入相对较低。因此，在大多数国家中，农业就业人口比重的持续下降趋势仍不会改变。

(2) 就工业部门而言，其收入的相对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而就业人口的比重一般保持不变；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分析，该部门收入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是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共同经历的过程，尽管该部门就业人口的相对比重因各国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变动不大。

(3)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服务部门的就业人口比重都在上升，而该部门的收入比重基本没有发生改变或略有上升；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分析，服务部门的收入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而服务部门中，科研、教育及政府机关的就业人数所占比重的上升速度最快。

导致第一产业的收入和就业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第一，低收入弹性是由社会对农业产品的需求特性造成的。具体来说，作为生活必需品的农业产品，当社会总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农业产品的社会需求量并没有伴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就导致农业产品的社会需求量开始下降，不利于农业产品获取附加价值，最终导致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少。

第二，农业产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在技术进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相比工业而言，农业的生产技术进步比较困难，这主要是由于农业投资受到“报酬递减”的影响，而对工业的投资则由于技术进步产生“报酬递增”。

^① 库茨涅兹 S. 国民收入及其构成[M]. 李艳萍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2.

第三, 农业就业人口的下降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农业产值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必然结果。

工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基本维持不变, 而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不断上升, 其原因在于消费结构的变化导致工业产值的弹性不断提高。另外, 政府对于工业产业的投入不断增加, 政府全部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也有利于农业的高收入弹性, 这也是导致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的主要原因。随着工业产业中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 工业产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增加开始对原有的工业就业人口产生排斥, 而工业产业的行业性扩张造成工业企业的就业岗位不断增加, 工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 这两种力量相互制约, 导致工业就业人口的相对比重保持不变。

就服务部门而言, 该部门的就业人口比重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而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上升幅度则比较小, 其原因在于“服务”作为一种商品, 它的收入弹性要比农业产品更高, 再加上服务产业中的大部分行业具有资本和劳动力容易进入的特点, 这导致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比较困难。库兹涅佐夫对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的若干国家进行了比较, 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 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业和工业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较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往往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 而在发达国家占主要地位的则是工业。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主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非农产业。

阿瑟·刘易斯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分析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发展的演变过程, 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古典”劳动力转移理论^①。刘易斯分析认为,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现象^②, 一个是采用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工业部门, 另一个是采用传统生产方式的农业部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基数大且人口增长速度快, 再加上土地等资源十分稀缺, 出现了农业产业的资本投入有所下降、农业产值不断递减及规模不经济等问题, 这迫使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批量地前往城市寻求就业机会, 因此劳动力在产业与区域间的双重转移便得以实现。根据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理论, 由于涌现出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城市工业企业的工资收入水平仅略高于农业收入水平, 并迫使全社会认可这两个生产部门的收入水平。最终导致拥有较低的边际生产率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中的工业企业, 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到农村因剩余劳动力转移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的过程会对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提高产生推动作用, 最终导致刘易斯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现象消失。上述经济发展

① 刘易斯 W A. 二元经济论[M]. 施炜, 等译.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②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d of labor[J].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22(2): 139-191.

现象就是刘易斯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含义。

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是有缺陷的,他们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与完善,进而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①。这个模型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变化的条件与发展阶段。他们首先批判了刘易斯理论中只注重城市工业产业的发展,忽视农业发展的观点,进而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他们的观点具有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特点。他们认为,保证农业现代化发展,提高农业产品产量,可以满足日益增加的非农就业人口对农产品的不断上涨的需求^②,这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顺利转移的前提。如果农业无法实现现代化发展,无法将高新技术和产业资本与农业融为一体,那么这种带有传统生产方式的农业必将导致非农产业生产成本过高,从而影响非农产业发展的利润增加与资金投入,并导致第二、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

经济学家乔根森也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劳动力转移理论做出了新的补充说明。他否定了传统古典经济学中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恒定假说,也对农业中的边际劳动生产效率为零和农业与工业部门的工资收入水平固定不变提出了批评^③。他假定,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工业部门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农业部门,并假定这两个部门只受劳动力和资本因素的影响。在技术进步呈现常态发展的情况下,乔根森进一步完善了二元经济模型及相关的劳动力转移模型。他从农业产业发展和人口持续增加的视角出发,研究了农业剩余、工业产业发展、农业产品剩余及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人口增长率低于人均农业产值,将导致农业产品出现剩余,为农业劳动力向现代工业企业转移创造条件。乔根森还认为,劳动力自由流动是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条件之一,随着农业剩余产品的不断增加,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实现非农就业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工业化速度也会越来越快。

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剩余劳动力会不断向城市工业企业转移,而城市工业企业则通过不断创造就业岗位来保持吸纳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农村和城市都存在失业问题。对此,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提出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④,找出了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即使受到失业的威胁,仍旧不受影响继续转移到城市的原因,进一步完善了刘易斯的理论。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在明知有失业风险的情况下仍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原因在于对预期收入的期望值过高。他们的依据在于

① Fei J C H, Ranis G.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surplus economy[J]. Theory and Policy, 1964, 77(306): 346-349.

②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③ 托达罗 M P. 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 印金强, 等译.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2.

城市的实际收入大于农村及城市就业机会较多^①。托达罗考虑到就业机会因素,进而揭示了农村劳动力面对失业风险依然向城市转移的原因。这一决定也是根据转移到城市以后的预期收入而不是实际收入。

斯塔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再一次对劳动力转移理论做出修正。他将劳动力转移的视角放在劳动力所在的家庭,而不是以前的劳动力本人,在家庭利益最大化的假定前提下分析劳动力转移行为。他从风险的扩散性入手,认为一个家庭的迁移或留守是分散风险而采取的多样化经营策略^②。这一新的劳动力转移理论基于契约安排理论和投资组合理论揭示家庭转移决策和劳动力转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契约安排理论,一个共同的契约制约了劳动力及其家庭的转移行为。首先,家庭成员以劳动力转移者向其提供汇款的预期收益为条件,对劳动力转移者提供资金支持。换句话说,汇款成为劳动力转移者和其家庭成员之间赖以维系的契约安排。劳动力转移者也会根据所获得的预期收益,如继承家庭财产等方式,使汇款活动成为连接劳动迁移者和其家庭成员的纽带。基于此,劳动力转移者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通过契约安排各自获得利益,同时使家庭总体收益最大化,进而使劳动力的转移行为继续进行下去。其次,根据投资组合理论,为了减少家庭总收入的不稳定性,农村家庭必须重新配置家庭内部的劳动力资源。为了减少这种家庭收入的不稳定性,只要劳动力转移获得的收入不同于农业波动收入,就会由家庭成员外出务工获得稳定收入。换句话说,农村劳动力并非完全是为了获得城市工业企业中更高的工资收入而选择外出务工,这一行为也是为了规避农业生产风险而做出的理性判断,其目的是确保长时间内家庭收入的稳定性。最后,我们也应该看到,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劳动力转移在城乡之间频繁流动与之前的一次性转移有很大不同。新劳动力转移理论认为,出现这种劳动力在城乡之间频繁转移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交通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频繁转移的根本原因体现了家庭投资策略的多样性及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

“推-拉”理论也是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延伸。唐纳德·博格于 20 世纪 60 年代根据 E. G. 雷文斯坦的人口转移推-拉理论,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关于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这一理论从人口移动因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人口转移是两种动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推动人口转移的动因,也就是有利于人口转移的积极因素;另外一种阻碍人口转移的动因,是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因

① 托达罗 M P. 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 印金强,等译.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② Stark O, Taylor J E. Migration incentives, migration types: the role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91, (101): 1163-1178.

素^①。对于人口迁出地的劳动力来说,推动因素占主导地位。这种推动因素有农村劳动力资源过剩导致显性或隐性失业、农业生产成本过高、收入水平过低及自然资源枯竭等。就迁入地而言,拉动因素占主要地位。迁入地是否存在较多的就业机会,是否可以提供较高的工资收入,受教育的机会是否多,交通、文化等基础设施是否完善,以及生活水平是否较高,生活环境的良好程度,都成为影响吸引农村劳动力,产生拉动因素的重要因素。同时,必须指出,农村地区对人口迁出并不是完全只有推动作用,它也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如家庭关系、人脉资源及对周边环境的熟悉。迁入地区也并不只存在拉动因素,如激烈的就业和晋升竞争、对于环境的陌生及与家人长期得不到团聚等。但总体上说,就迁出地而言,推动因素占主要地位,这时推动力大于拉动力;而就迁入地而言,拉动因素占主要地位,这时拉动力大于推动力。基于此,“推-拉”理论的动因在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速低于城市。

成本-收益理论是由斯加斯塔德提出的,这一理论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劳动力转移行为。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非货币成本,收益也包括货币收益与非货币收益。在职业生涯中劳动力转移者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收益为目的。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分析,只要能给劳动力转移者带来投资收益,那么他们就会做出转移行为。从更深的角度分析,这种迁移行为也会给社会带来收益。

第二节 农民工市民化相关概念界定

一、农民工概念的历史演化

从最初的“盲流”“民工”到后来的“打工仔”“打工妹”再逐渐演变为“外来务工人员”“新产业工人”等,最终形成了现在被广泛熟知的“农民工”一词,这个概念在被认同并且约定俗成使用之前经历了多次的演化过程。

(1)“盲流”。国内这个词语首次出现并使用是在《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紧急通知》中。此通知于1953年7月由中央政务院颁布。它可以根据字面意思进行解释,即盲目流动的人群。在我国实行的户籍制度中,盲流指的就是农村户口持有者。20世纪50年代初,每年都有大量因为贫困而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他们没有长期正式工作和生活保障来源。20世纪50年代末,这种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现象愈演愈烈。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成为普遍现象并达到高潮。而现在“盲流”一词的本意已经逐渐地淡化了,逐渐演变为一种带有贬义意味的恶俗用语。可以看出,“盲流”一词对于农民工的解释是具有

^① 邹新树. 农民工向城市流动的动因:“推-拉”理论的现实解读[J]. 农村经济, 2005, (10): 104-105.

一定歧视性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2)“民工”。人们将在政府的号召下参加公路、堤坝和参与帮助部队运输工作的农民称为“民工”,这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而在改革开放后,“民工”一词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指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民工”这一词语的概念和内涵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看出农民脱离土地外出务工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也催生出了“农民工”这一称呼,从而改革开放后慢慢取代它的位置。

(3)“打工仔”“打工妹”。“打工仔”和“打工妹”这一称呼开始在南方地区使用得较为普遍,它主要是源于南方方言,但是起始时间无从考证。20世纪90年代初,一部反映了在广东地区打工的进城务工者生活的电视剧《外来妹》红遍大江南北。人们的视线也逐渐集中到这一特殊群体,这也使“打工仔”和“打工妹”的称呼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成为全国范围内对外来务工者的通用称谓。改革开放之后,南方珠三角地区成为“打工仔”和“打工妹”争先聚集的地区。这些年轻人从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率先走出来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打工仔”和“打工妹”的称谓反映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基本特征——年轻,同时工作的性质是雇佣劳动。

(4)新产业工人。农民工第一次被归纳成为新产业工人是在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下发的《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提到“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这是首次在理论层面提出这一科学论断。它明确地界定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职业属性。这一改革充分表明了农民工在逐渐向工人阶级转变的趋势,同样地,农民也在向着市民进行转变。这也从国家的角度承认了农民工在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阶级地位及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工慢慢开始具有与工人阶级相同的属性。同工人阶级一样,农民工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他们的工资收入,并且多数农民工是和社会化大生产相关联的,他们也具有一定的组织和纪律性,在本质上同在城市的工人阶级无异。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②。作为新产业工人的农民工已经是我国产业工人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些对于农民工的描述性词语,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甚至有一些略带歧视性的称呼,其实都是从各个角度反映出农民工这一群体的职业、阶层、户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EB/OL]. http://www.gov.cn/googobao/content/2004/concent_63144.htm[2003-12-31].

② Dantel L.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modernizing middle east[J].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1960, 24(19): 117.